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六三 ——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312b)

---

【史海钩沉】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	宋永毅
【峥嵘岁月】我们如何成了钟馗？——《从太阳不露脸谈起》读后杂忆	周孜仁
【千秋功罪】跳出黑白两极的是非分野	丁凯文
【痛定思痛】我看37年前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孟令伟
【各抒己见】中国人为什么迄今敬重周恩来？	高伐林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史海钩沉】

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

• 宋永毅 •

《华夏文摘》的编辑华新民先生最近写了一篇极为精彩的影评“从太阳不露脸谈起——观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谈的是我的朋友卡玛女士摄制的有关文革的电影。影评中他谈到了当年红卫兵的觉醒，并举了一个今天已经为大多数人，甚至文革研究者都遗忘了的名字：朱成昭。

对此，华文是这样回忆的：“大学生红卫兵当中也有觉醒者，尽管为数不多。大学生思想深一些，阅历广一些，这些觉醒者，不像中学生中的老红卫兵那样是因为自己的老子成了运动的打击对象，而是看到了毛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他们中的一个代表就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朱成昭。现在的文革史提到文革中有名的‘五大领袖’都是指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其实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是朱成昭，他也是大名鼎鼎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最早的‘司令’，当时的名声不在蒯大富之下。但是不久之后朱成昭这个名字便消失了，换上了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王大宾。其中原因，据当时流传的故事说，是因为当时地院‘东方红’从四川把彭德怀押回北京，红卫兵的头头们

在大会批斗前秘密预审彭德怀，彭将自己同毛在庐山会议上交恶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竟然说服了朱成昭等几个人，使他们幡然认识到，文革的源头是批判《海瑞罢官》，而‘海瑞’就是彭德怀，毛发动文革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自己的‘三面红旗’，扫除一切同情彭德怀的领导人，消灭一切替彭翻案的可能性。朱成昭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后，还同另一个造反派学生领袖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派人抓了回来。据知情人说，实际情况是，朱是调干生，对大跃进以来的中国社会现状早有自己的看法，彭德怀的一席谈话只不过是印证了他久存在心中的怀疑而已。叶向真受到周恩来的保护，在文革后似乎还出来拍过电影，朱成昭则不知所终。”

正巧，我因为研究文革中的异端思潮，1998年8月11日在澳洲记者晓涵和美国《时代杂志》北京记者米雅的安排下采访了朱成昭先生。在长达3小时的访谈中，对他的觉醒、叛逆和受迫害的全部过程有了第一手的了解。本来，我与朱先生相约来年在京再畅谈一次红卫兵运动，但不料不久就传来了他因心肌梗塞而猝然逝世的噩耗，目下在我办公室中的3卷录音竟成了我能听到的他最后的声音。

朱成昭，安徽人。其父在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一个副局级老干部。他1960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当时是整个上海乃至全中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在上中，他是品学兼优的团干部、好学生。以至一毕业，中国科学院因一个在计算机方面尽快赶上西方的秘密计划，直接把他抽到上海的计算机研究所工作，作为未来的专家培养。朱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已经担任了课题组组长。然而在工作中他感到了自己科学基础知识的贫乏，决定再去读大学。受到当时在上中最为流行的《勘探队员之歌》的影响，他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因为他是从工作岗位上再来读大学，就变成了“调干生”。1962年入校后，正值阶级斗争之风盛行，朱和不少同学一起被两次派出参加“四清”。

1966年6月文革爆发，朱是水文系四年级学生。他和一些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同学一起给以邹家尤为首的地院工作队提了一些意见。被划为“第三类学生”，在工作组整的黑材料中已经定下“送去劳改”。当时的工作队副队长边固在一次对“第三类学生”的训话中竟骂他们：“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值！”朱和蒋良朴、田春林、梅建明等同学一起被逼上梁山，7月份揭竿而起“造反”，8月8日成立了地院“东方红公社”。因为朱和他的伙伴们在组织路线上不搞“血统论”，东方红公社很快成为地院的绝大多数派。1966年9月6日，由朱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据朱在采访中告诉笔者：首都三司从来没有设立过“司令”一职，但他当时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大学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要他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他当即派过一支地院东方红的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队伍。后来，朱又请蒯担任三司的副手，这便是蒯大富是三司“蒯司令”的流传的由来。

对三司和地院东方红公社这样主要的造反派红卫兵队伍，中共中央的各派当时都想要利用。毛泽东自7月起便一直派他的女儿肖力（李纳）任直接的联络员；周恩来有一个秘密联络员“老李”；中央文革的关锋、阎长贵等都担任过观察员和联络员。1966年9—10月间，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当时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来地院求援，认识了朱成昭。两人在不少政治观点上非常一致，不久又坠入情网。这对朱的思想有不小的影响。另外，文革的深入把许多老干部，包括朱的父亲都打成了“黑帮”，也使他对文革有新的思考。

1966年11月，地院东方红公社接受周恩来的秘密命令，把彭德怀从四川抓回北京。另外，江青、戚本禹也在同时对他们和北航红旗有过抓彭的指示。朱曾派了第三批人去抓彭。第一批王大来、钱信等人在12月15日进入彭的住处，与彭就文革以及党史上的一些问题有过长谈，结果被彭感化，认为彭讲的都是“真话、实话”。最后对彭同情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可

能现在不了解彭现在的情况，他们有责任把彭目前的情况和他们的看法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汇报”的地步。第二批是当时东方红公社的第三把手王大宾，于12月18日到达成都，又和第一批抓彭成员一起回京与朱商量。

因为朱的安徽老家“三年自然灾害”中也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朱对彭一直持同情态度。他们把在四川时与彭的谈话记录交给了中央文革，被训斥为“严重政治错误”。中央文革又马上派了北航红旗赴川抓彭。在这一情况下，朱派出第三批胡乐成等100余人，从北航红旗手里抢回了彭。12月27日，彭德怀到达地院后，住在朱的房间，不过朱成昭和他没有过外面流传的“秘密预审”、“彻夜长谈”等接触，甚至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然而，彭德怀当时有一套绝密材料，放在他随身携带的小箱子里。是他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反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看法等等。朱成昭仔细地看了这些材料，受到震动。这对他和他的伙伴们转变对文革的看法无疑有极大影响。他们一致认为：彭说的都是“实话”。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朱成昭、叶向真、蒋良朴、王大宾等人在梅建明家连续开“黑会”，准备公开炮打中央文革。不料王大宾偷偷向中央文革告密，67年1月23日，陈伯达写批示给朱，警告他：“不要掉到茅厕里去，成为茅厕里的石头”。为了有一个机会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朱成昭决定以“检查”为名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2月4日，朱在地院作公开检查，因为这是首都三司“司令”的检查，共有3万人参加。朱在会上谈了他的“八大观点”：1）大串联搞乱了全国；2）整风军训实无必要；3）中央文革运动群众；4）中央文革抓人太多，比如联动；5）中央文革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6）中央文革太左；7）在军委和中央文革之间，站在军委一边；8）大联合大夺权早了。由于朱借“检查”为名系统“放毒”，这反而影响了很多对文革有怀疑的群众。2月8日，阎长贵到地院宣布这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

1967年2月后朱被勒令“闭门思过”。7月，他因为和叶向真南下广州玩，被戚本禹诬蔑为：“偷了地质部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抓回北京。开始隔离审查。在他8月15日所写的“我的检查与交代”中，担心全国武斗以及两派分裂将会在地院后造成经济和人心两方面的“极大后遗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当时难得的真相灼见。

8月20日左右，朱被公安部正式拘留。与叶向真一起被打成“叶朱反革命集团”。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作为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叶向真在1972年林彪事件后即被周恩来释放，先去解放军的301医院学医，当了军医。文革后重操戏剧导演的旧业，当过电影《原野》的导演。她在1972年释放后便向朱成昭的朋友们表示，周恩来要她不要再和他们来往。但是据朱的朋友们向叶选宁（叶剑英的儿子）核实，周没有此说。而朱在他长达10年的牢狱和劳改生涯中，一直把叶向真当作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恋人，还写了许多动人的情诗。这大概也是一个高干的女儿和一个普通干部的儿子难以成婚的常见悲剧吧……

朱成昭在1980年6月正式平反。当时据说中组部准备树两个反文革的典型。一是死去的张志新，二是活着的朱成昭。但是最后被叶剑英一笔勾去，理由是活着的树典型不好。据朱成昭说，他和叶剑英文革中失之交臂，一直没有见面。1967年1月19日，叶向真安排父亲与朱成昭见面。一是军委的几个老师也想拉拢利用造反派红卫兵，二是叶剑英也想见见“未来的女婿”吧。但是因为那晚发生了几个老师和中央文革小组冲突的“京西宾馆事件”，最后叶剑英叫秘书撤销了会见，此时朱在叶家已经等到半夜。此事，朱一直感到非常遗憾。

1985年朱成昭被分配到苏州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工作。90年代初他在上海下海，组织过私人的建筑公司，负责地基打桩。据他说：“一开始事业做得比当年地院东方红公社还大”。但是最后被“三角债”活活拖垮。在我采访他时，朱已经退出商界准备潜心研究文革了。

据朱在接受我采访时说，我是“世界上第二个采访（他）的人，”第一个自然是指晓涵和米雅。他之所以接受我的采访，还因为我也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是他的“小校友”。当他听说我准备就他的思想觉醒过程作专论研究，嘱我将来一定寄他看看，要和我“讨论讨论”。可惜的是，他不久猝死，我这些年忙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对“叶、朱反革命集团”的研究也一直没有成文。现在华新民先生提到了他的名字，使我感到我应当把当年访问的大要先告诉世人，因为朱成昭实在是一个红卫兵运动史和文革思想史上的一个不应当忘却的名字。

~~~~~

## 【峥嵘岁月】

我们如何成了钟馗？  
——《从太阳不露脸谈起》读后杂忆

• 周孜仁 •

无缘观看卡玛摄制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但读过华新民《从太阳不露脸谈起》，影片里那些镜头，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老红卫兵们的辉煌、追悔和无奈，大体想象得出来。

我也算是那一代人了，也曾经“八、九点钟”过。只是“八、九点钟”那会儿我神气不起来，反倒是窝囊得很。家里没有“革干”“革军”之类有权有势的好爸爸，又想实现少年人谁都有过的好梦，我从小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

那么，为何后来恰恰又是我们这帮家伙接替了刚刚倒台的“小太阳”们，在毛泽东导演的文革闹剧里继续做了一会钟馗呢？细细回忆一番，把其时所历所为的某些事体记录下来，作为个案，权为华文作一注脚，也供有关史家参考。

先父是个小生意人，一辈子为生计辛辛苦苦摸爬滚打。他没什么文化，却满脑子旧思想。解放那年我五岁，啥事不懂，就知道父亲喜欢发牢骚，甚至斗胆敢说共产党的不是。记得1956年书刊的印刷排版与国际接轨，由竖排改而为横排，父亲就悻悻地说过：“但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外间说的全是共产党、新社会如何之好，回家来听得如此另类言论，我对他非常反感。不是出于理性判断或慑于当局权威。小孩子总希望周围环境对他认同，必然也需要自己与社会认同。事实上父亲并非反动派。他讲求实际。1957年我党才把右派的猖狂进攻打垮那会儿，大跃进。全中国人人听党的话。社会秩序好得很，路不拾遗。父亲上菜场把老怀表弄丢了，让人拣拾璧还，他真诚地把共产党赞美了老半天。

我之所以拥护共产党还有一个原因：从小做梦，长大要把画家当。没有文化的父亲固执地认为画画儿不过是“雕虫之末技”，是“糟蹋纸”，所以“犬子”在家作画一贯鬼鬼祟祟，和作贼差不多，一经老父发现，定然严惩不殆：臀部受苦或罚跪祖宗牌位什么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对比：老师对我的美术作业从来称赞有加，每年六一儿童节，我总有上台领取美术奖（一块橡胶皮或一支铅笔）的荣誉，满堂掌声对于小娃娃的虚荣心实在太够满足了。老师所代表者，共产党是也。因此我对共产党从小感激涕淋。我觉得我幸福至极。正如贺敬之诗歌所云：我以为我面前就是——大道、鲜花，朝霞似锦。欢乐、歌声、红旗如云。

后来就出了一件事。时间是1959年秋天，高二年级的注册日。我去学校报到。从家到学校要路过东玉沙街西南局所在地。西南局乃中共中央派出机构也，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圣地。每次路过那儿我都肃然起敬。但那一天见了鬼，刚刚路过，一幅突如其来的景象顿时把我吓呆

了（我发誓，我真的呆了！）。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一队农民正在几个村干部模样的人的监视之下蹒跚而前。他们裸脚缁衣、面容枯槁、骨瘦如柴，简直就是一群奄奄待毙的囚徒、一群从地狱逃出来的野鬼！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类似惨象，我仅仅在反映灾年农民起义造反的电影《宋景诗》里看过。但那毕竟是演员的表演呀！而我面前，现在全是真的！

我不知道这帮尚能行走的饿殍要干什么？要到哪里去？他们只管神情呆滞地被人驱赶前行。有一个人显然已经无法忍受，当队伍走近七家巷口（我的母校就从那儿进去），他便企图逃跑——我只能说他企图——他的身体状况实在无法实现他的意图。太饥饿，他根本无力跑动，没跨出几步，自个儿便就跌倒在地上。押解的干部手提皮带，赶上去，当场就一顿好打……未经世事的少年被吓得不忍卒看，我匆匆离开了。

那时我已经开始懂事。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在我的家庭里，至少有两个人“政治”上出了点问题：一是我的三哥，成都25中学生会主席。我看过他的毕业证，所有功课全部“五分”，唯有品行“三分”——品行“三分”就是不及格。不及格的原因是他年龄比较大，关心国家大事，喜欢看报，看了报还喜欢发表议论。有一回报上介绍中苏联合开发某油田，双方如何分成。这种事在大人看来其实很正常，可小娃娃偏偏搞不懂，他就说了一句：“不是说无私援助吗？怎么还兴把我们石油分走呢？”这话被人一告，品行就“三分”了。品行一“三分”当然就别想升学了。还有一个哥哥，也顶聪明的，可偏偏和班团支书搞不来。需知，共青团乃共产党的助手，得罪了团支书就等同于得罪了党支部，就铁定得罪了共产党，实在罪莫大焉，升学也就告吹。那时候反右派斗争刚刚胜利不久。

说到反右派，我的直接亲属里倒没人遇到麻烦。前面说过，父亲没什么文化，家庭整个儿没条件培养文化精英，出右派概率几乎为零。但神使鬼差，那时偏偏有个右派家伙和我这娃娃发生了一点关系。此人名唤储一天，作家，文艺编辑，其时正供职于四川省文联《草地》文学月刊。储先生转弯抹角的堂哥不久前刚刚成为了我的姐夫。姐夫知道小家伙正痴迷于画家美梦，遂把这个储姓大编辑请来家里看我画画，市井穷街的初中生便有幸与心中的大编辑留下一面之交。储编辑对我的作品赞赏有加，绝对不心疼地对我许了一愿：以后长大了，你来我们编辑部，当美编去！我当时的激动绝不逊于虔诚的基督徒听到上帝的福音。只是储此一去便渺如黄鹤，再也没有了音信。第二次见他，已是第二年春天。在成都市反右斗争伟大成果展览会的版面上，他被画成了青面獠牙的国民党匪徒，和我见过的文质彬彬的形象简直南辕北辙：他正在拔枪射杀革命志士。解说员义愤填膺地介绍说，储一天（原名储振球）是隐藏很深的特务！已被我人民政府逮捕法办！斩钉截铁的论断吓得我心惊肉跳——储1979年“改正”，安排四川江津市文联工作——某次笔会，该市作家陈朝露向我出示了一张他和储的合影照。这是我第三次见到这位转弯抹角的右派亲戚，他垂垂老矣，但笑得依旧和善，总让我无法和展板上那位拔枪行凶的特务联系在一起。这是后话。

既然有如此危险背景，我安敢对社会说三道四？饥民事件就被完整地幽闭进了一颗被扭曲的心，整整幽闭了几十个年头，直到文革结束才敢向人说起——那时整个国家都在反省。

更为糟糕的是：开学不久又遇了一堂作文课：自由命题，体裁也任由自选，但内容有规定，必须歌颂大好形势。必须是“三面红旗万万岁”。正值十年大庆，我就写了一首长诗。模仿马雅科夫斯基风格：梯格，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天花乱坠地猛吹一通。为了节省作业本，我把一页纸分成两边书写，即使如此，这一篇作文还是把整整一个本子全部耗光。足见诗歌抒发激情长度之长。剩下唯一一页，被老师大大地写了一个“5”字。作文评讲课，老师把这个“5”字高高举起，向同学们宣布：瞧：本次作文，我们班出了一朵大香花！

几十年来，此事总像阴影一样在我头上挥之不去。让这样黑暗的事情严密包藏在一个十五

岁孩子透明的心里，这是多么残酷啊！能够包容如此黑暗的孩子的心本身就必然是被扭曲了。要不，他怎么会如此无耻地去歌颂原本的虚假呢？一个真诚的孩子，只会对穿着“新衣”的皇帝说：你原来一丝不挂呀！

但是我们已经没功夫对世事的越来越荒谬作出评价，更无力对自己最初的虚伪作出反省：大饥荒很快降临在了每一个人的头上。整整三年多的时间里，人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肚子。乡下不时传来成批成村饿死人的消息。为了让母亲吃到一块糠馍馍，星期日放学回家，我总得去餐馆门口排上几个小时的队。很多同学得了水肿病。体育课是整个儿停了，除了比划比划太极拳，老师已没有力气进行任何动作示范。年轻人课后聚谈，睡前梦想，永恒的热门话题都是：这辈子何时能吃到一嘴红烧肉？

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上大学。

我对大学的最初认识是从苏联油画里得来的。五十年代初“老大哥”来北京搞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有一幅油画的题目就直截了当叫做《大学生》：窗明几净的学生寝室，四个大学生懒洋洋地迎着阳光颂读诗歌。远处是莫斯科高耸的尖塔和明媚的天空。充溢在画幅上诗一样的浪漫情调，整个儿鼓满少年人梦的风帆。但是我在重庆大学——我的母校——第一眼看到的，却是食堂里慢吞吞移动着的一字长蛇阵：为了从巨大的木桶里捞取几片发黑的菜叶，挤在桶边的大学生很有耐心地用铁勺搅动汤水，顺时针又反时针、反时针又顺时针地来回捕捉飘流的目标物。分饭方式更是五花八门。饭是用洗脸盆蒸出来的。八人一盆。自个儿平分，每人正好八分之一：底边为圆弧的三角形，酷似大写希腊字母“得尔塔”。“得尔塔”在高等数学里常用来代表“无穷小”，用它来称呼面积积极小的饭坨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为了避免分饭争端并有效保卫自己的利益，大学生发明了许多方法，可谓百花齐放。采用拈阄者（即将饭坨编号然后用纸团拈阄以确定其归属）有之、打飞叉者（将饭坨分好后，每位参加者需在桌前旋转若干圈，确保晕头转向而不带任何理性选择地将饭叉瞬间掷出，戳着哪坨吃哪坨）有之、轮流坐桩者（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即每位参与者均有一次机会选择最大的一坨“无穷小”）有之……总之，如今任举一例都足以令人喷饭。这些方法的记录完全足以构建一部关于饥饿年代人类生存状态的专著。我还必须承认：大学生当初在分饭问题上表现的非凡智慧，后来成就了许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杰出领导人。

把大学生说得如此委琐低调，并非诋毁他们的政治激情。不，恰恰相反，就在大伙儿肚子依然饿得咕咕直叫的当儿，辅导员在学习会上痛陈苏联修正主义之如何逼债，哥儿们立马义愤填膺——辅导员接着又是一句，“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困难到此为止！”——同学们简直就像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随时准备从容赴死。那激情绝不亚于科索沃危机那几天游行示威于美领馆门前的现代青年。几十年后重读《三国演义》，读到军营口粮告罄、曹操借粮官人头平息众怒一节，我不期然便联想起了辅导员的精彩报告。感谢古人为后来者提供了那么丰富的政治智慧，还要感谢他们在具体做法方面提供了同样丰富的经典样板。

1961年秋，苏共召开22大，大学生们一下课就往图书馆跑：等候《人民日报》的到来。人太多，只有一份报，于是让挤在前面的幸运者大声颂读。听到靠援助过日子的阿尔巴尼亚“霍查同志”大义凛然对苏联“赫鲁晓夫同志”说：“宁肯站着生，不愿跪着死！”，图书馆里顿时响起动人心弦的掌声，鼓完掌才腾出功夫来想漉漉饥肠，然后就不要命地往食堂跑。一年后中共和法共“多烈士同志”、和意共“陶里亚蒂同志”、及至后来撕破脸皮和苏联修正主义论战，大学生们肚子已经吃得饱饱，没后顾之忧了，激动起来就更加肆无忌惮。

古哲人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力量足以让人去拼命、去移山倒海：爱情和宗教。那时大学生是明文不许恋爱的。共青团员必须在组织生活会上如实交出情书，当众销毁并保证下不为例，

永不重犯，违者团员以团籍论处，非团员以纪律法办。爱情既已斩尽杀绝，那么大学生们有如此亡命冲动，就只剩下一种解释了：宗教。重庆大学当时是一所综合性的工科大学，可我总以为我是修业于一座神学院。

我必须马上提到的，是在此期间还发生过一件大事：学雷锋。那时我在校业余文工团美术队当队长，已经全然没有当年我做画家梦时的艺术情趣。就像一个人本要寻找心中的上帝，却不可避免地落入了世俗的牧师手中。美术队的任务是在校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下做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刚刚下达“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布展任务时，我心态非常事务主义。几年间学过的英雄太多，我习惯地把雷锋和他们之中的任意一位等同。宣传部分管美术队的辅导员于是神情凝重地对我进行教导：雷锋可不是普普通通的英雄啊。雷锋是我党的孝子！中国古代不是有个“二十四孝”吗？我们共产党也要树立自己新的“二十四孝”！

最初用“二十四孝”教育我的当然是满脑子旧思想的父亲。那时我还小得很。“郭巨埋儿”、“老赖戏采”之类的故事在我贫瘠的脑子里记忆颇深。祖父早在我出世前就死了，家父当然绝无意将我活埋之意，老赖的故事又只让我感滑稽。政治辅导员可不一样了，仅仅看看他的表情就让我不敢掉以轻心。辅导员叫陈梦龙。大学时代我最崇拜的老师。我之所以崇拜他，是因为他不像其他政治辅导员那样只会干巴巴说教。他的画画得很有才气。他还能弹得一手好吉它。他说话风趣幽默，潇洒自如——我之于他，有点牛虻之于神父蒙泰尼里的意思。1992年陈梦龙死于肝癌（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阿门！），追悼会那天我正好由深圳回重庆公差，匆匆赶去石桥铺火葬场和他的遗体告了别。遗体很干很瘦、缩得短短的。和我大学时代看到的完全两样，显得怪可怜。追悼会后，他的一位挚友对我说，他英年早逝，完全因为挣钱太亡命。课余时间他总是片刻不停地到处帮人制作模型，加工旅游工艺品。家里本来就窄，成天和香胶水、502之类打交道，吸入有害气体太多哪！能不死吗？这是后话。

学雷锋，我学得非常亡命。刚上大学时还有个提法，叫做当“红色工程师”。为了当这个“红工”，我的期考试成绩总是门门“5”分，后来学雷锋了，“红工”不能当了。工程师本身就有人主义之嫌。我顺应时尚，把自己的理想重新定位为做党的“驯服工具”，更具体一点，就是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在深圳办过一个标准件厂，就是生产螺丝钉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生产工艺是这样的：把不锈钢丝通过切丝机切成小段小段，经过打头机打头，然后送进搓丝机，一分钟可连续搓出几十、好的机器可以连续搓出上百颗。足见制造是很简单的。记得某日我去车间，看见螺丝钉从出料口哗哗地倾泻而出，我曾经莫名其妙想起了年轻时代的理想，忍不住在心里暗暗失笑：当年我怎么要死要活、伤精费神想当这玩艺儿呢？

几十年后，才知道这种提法并非海内孤本。大洋彼岸有个响当当的职业革命家，西方青年心目中，他的名字足以和毛泽东相提并论：切·格瓦拉。他在古巴那个弹丸之地执掌权柄后曾明确宣布，自然人都是些不合格的“半成品”，革命要想最后成功，必须想办法把他们通通改造成成为“有觉悟的、有自己特点”的、革命车轮上的一只“幸福的齿轮”。史料记载，他的宏图几经努力而不可得，于是幡然顿悟，发觉只有在“战争”环境中方可造就如此革命“新人”，切于是慨然舍弃高位，重归山林，直至饮弹身亡。中、古“工具论”两相比较，我以为至少有两点不同，虽然同属标准金属件，但一为齿轮、一为螺丝钉，前者在体积和功能方面比我们略大略高一筹（它们的齿轮还“有自己特点”并“幸福”着）；其二是格瓦拉所宣布的“半成品”包括了一切人，中国的螺丝钉原材料却严格分为三六九等。“革干”“革军”子弟自然是金枝玉叶、上好原料，一生出娘肚子就“自来红”，甚至勿需加工便可派上用场。其余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属于二等原料。惟有各种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娃娃们一出娘胎便朽株枯木、难堪造就，非经脱胎换骨，很难送进流水线搓成产品。

1963年至1964年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我就面临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前面说过，我父亲是个旧脑筋，没多少文化，我对他从小反感。我的所有理想、都是从老师、从保尔·柯察金、从牛虻、从卓娅和舒拉、从古丽亚……那儿继承过来的。我压根儿不承认自己受父亲什么影响。但问题在于，伟大领袖有言在先：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不受家庭遗传，你爱恨何来？不承认是不行的。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政策性问题把我搞得焦头烂额，这就是：恰恰在快要解放的时候，具体说，就是1947年前后，父亲的生意就彻底垮掉了。有充分证据说明，生意垮掉后家庭生活是很拮据的，父亲有一万条理由感谢新社会给家庭生活带来的转机，感谢共产党的恩情。问题是“1947年前后”这个时间很微妙。按照我党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需按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为依据。父亲生意垮台正好在三年前后，——谁也说不清彻底垮台具体发生哪一月哪一天——这就成一桩无头公案了。按照我党政策：“拉一拉就可以过来，推一推也可以过去”，我父亲成个边缘人。搞不清属于剥削阶级？还是被剥削阶级？从而我也无法搞清楚父亲到底属于革命动力还是革命对象？他遗传给我的，到底是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还是剥削阶级的反动本性？我也成边缘人了。古圣先哲谈人生要义，最要紧的就是三个“W”：我是谁？（Who am I？）我从哪里来？（Where am I from？），我到哪里去（Where am I going？）。第一个问题就犯迷糊了，我还能干什么呢？我大姐参加工作是解放之初，那时候大家看得明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枚小五角星，堂而皇之地贴在五星国旗上。大姐在登记表家庭成分一栏里就非常自豪地填了一个“资本家”。这一填就把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全搞被动了。虽然我很狡猾地填为“小商”，但毕竟“商”啊。做生意不搞剥削还能叫“商”吗？不言而喻，父亲搞剥削儿子也好不了。必须深刻认识深刻检讨。

我变得从来没有的自卑。我羡慕的我的同学，不管他智商高低、成绩如何——仅仅因为他出身于贫寒山区一文不名的农家。我们学校鲜有“革干”“革军”子弟，多数是农村来的孩子。在苦寒山乡长大，他们很容易从自身的环境中找到素材：比如旧社会吃过何种非人类食品？地主家的恶狗如何之凶狠？（城里人是没见过地主及其狗儿的）乞讨要饭是怎么回事？等等——这些，都足以证明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早就通过基因遗传到了他们身上。虽然谁也无法证明事情真伪，但要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出风头，这些素材已绰有余裕。我对此羡慕不已。

所幸者，我尚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和大资产阶级相比，要想得到组织和领导的青睐，“小商”毕竟还多几分优势。机会主义主宰了我的整个生活。在没完没了的阶级教育会上，我挖空心思挖剥削阶级根源、找思想毛病，将自己贬得一文不值，让领导和同志们确信我字字句句确非戏言，确实是和“非无产阶级”家庭划清了界限。政治活动、军事训练等等，我的行动总要比任何人卖命，以为我的忏悔提供佐证。大量应该用于学习的宝贵时间被用去了参加劳动、宣传、演出、展览，1963冬天期考，“3”分第一次登陆了我的成绩单。学业荒废大约也曾让虚荣心备受折磨，好在不久后就传达了毛泽东对侄儿毛远新的伟大指示：书读得越多越蠢。焦虑的虚荣心得以平静，依旧侥幸梦想将来某日，原罪一旦洗涤干净，我就能和忆苦思甜会上出尽风头的哥儿们平起平坐了。

大四那年，命运给我的机会主义提供了一个表现自己的极好机会：按照中央指示，大学生必须停课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时间共七个月。川北农村全是大山，够艰苦。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某次，房东问我，你们几百里地，怎么走来我们这儿？我说坐车呀。他又问：车是什么？我说，就是四个轮托一只箱子，我们坐在箱子里就来了。房东刨根问底，又问：轮子是什么？我想了半天，说：就像你们磨面的石磨盘呀！磨盘竖起来，不就可以滚着走吗！对方恍然大悟，说：你们城里人真聪明！那年代南京有个知青典型，叫方玉，记得是个教授的女儿。“教授”身份绝不比“小商”尊贵，照样属于“拉一拉就可以过来，推一推也可以过去”的边缘人，所以我非常关注她的行踪。她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有一句话：“不艰苦，还锻炼什么？”我就信她这个。在如此偏远的山村，我偏偏还拣最远的生产队去。时任工作组长的县府小官吏没见过干活如此卖力的亡命之徒，公然在会上说了：把我们小周、小夏的材料写出来，比报上



的英雄动人得多！小夏是我的同班同学。他的表扬当然被我视为机会主义的又一次伟大胜利，于是大着胆子就向工作组递交一份入党申请——可惜事情没搞定。工作组只是将鉴定材料转回学校完事。而我十分清楚：一回学校我就很难蒙混过关的。

事实确实如此：四清归来，果然好几位同学都入了党，包括上面提到的小夏。他出身多代贫农，绝对根正苗红。这批四清中入党的同学，在不久后开展的文革初期，无一漏网地成了“誓死捍卫校党委绝对领导”的左派学生；市委工作组进校把校领导搞定后，他们顺利成章又成了“誓死捍卫重庆市委绝对领导”的左派学生。

几十年后重提这些旧事，对可亲可爱的大学同学我绝没有半点妒意。夫子毛公曰：“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是他们两口子的私房话，后来林贼驾机夜逃，为了挽回面子不得已公开出来。私房话尚能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公开传达，中国的政治斗争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只是开始时候谁知道呢？老奸巨滑的“副统帅”尚且被弄来当了一回“打鬼钟馗”，年青娃娃能知道什么呢？无非也是被人愚弄一回罢了。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左派学生、还有那些神气活现的老红卫兵之后，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们的了。美国有首歌曲叫《我们都是好人》，要准确描述六十年代的年轻人，应该编这样一首歌：《我们都是傻瓜》。

必须一提的是“左派学生”李长春——不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而是当年重庆大学动力系学生李长春。这个李长春时任合唱队队长，在学校文工团和我算是“同僚”。因为参加“四清”入了党，文革一开始便被市委工作组收入彀中，一路窜红，最后官至重庆市官办红卫兵“重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总司令。重庆地处偏远，“革干”“革军”子弟稀少，只好由农民孩子做代用品。如果套用北京级别，他就该是彭小蒙、骆小海一类角色。其实李长春为人极其老实平和，绝无半点乱世英雄气质。1967年重庆“思想兵”和全国的保守派一起垮台，他被造反派传令通缉，并很快在某小县被抓获。喜欢恶作剧的哥儿们用“思想兵”的袖标给他缝了一件红通通的“官袍”，让他一路敲打洗脸盆、一路吆喝“我是重庆牛鬼蛇神的总后台！”，像“牛儿拜四方”一样一个宿舍一个宿舍轮流跪拜请罪。看见“同僚”落到如此地步，作为胜利者的我曾在心中暗表同情。不过事实很快证明了我的同情纯属多余。一年后，毛泽东心情很好地说一句：“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立即浩浩荡荡开进校园对“臭知识分子”进行清算。又过了几年，整个国家恢复秩序，原来被打倒过的“走资派”重掌权柄，出于人之常情，他们自然会想起当初“誓死捍卫”过自己的“保皇派”。李长春很快由锅炉厂的技术员擢升为重庆市副市长。按官方的界定，那时尚属文革时期，全国的知识分子都还很臭，对他如此破格，足见“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还是很够哥儿们义气的。

还是回过头来说我自己。经过川北山区的七月修练，一则使我的机会主义恶性膨胀，自以为已经有了充分理由与出身优越者在领导前面一争恩宠，另外，就是我真的以为自己得领了毛泽东思想的真谛。“党变色、国变修”——这些本属于政客们利益攸关的事，与普普通通的工科生有多大干系？可当时我们偏偏喜欢为此忧心忡忡——危险不在于几个地主富农：他们都是些死老虎，用担任“四清”工作组长的县府小官吏的说法，就是：“几只跳蚤顶不起被窝嘛！”危险恰恰在于藏在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念头和川北山区的艰难生活一道根深蒂固地沉淀在我的脑子里，所以，当聂元梓的“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横空出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之类的社论铺天盖地而来，我确信共产党内部出问题了，“李长春们”牛气冲天地“誓死捍卫校党委的绝对领导”，好心人用1957年的例子对我痛切规劝，我却毫不动摇。机会主义鼓舞我在此难逢难遇的重要时刻冒死冲刺：为了在虚妄的事业里创立功勋，也为自己从贱民的困境里突围。两种念头交织一起，如此坚定、固执地把我推向灾难。我已别无选择。正如当时一首歌曲里唱到的“我们献身过壮丽的事业，无上幸福无上荣光”，意已决也，心已铁也，该拼一把了。我胆大包天，向校党委、向市委工作组，最后，

向重庆市委叫了板。

和哪个年代发生在许多人身上的故事一样，我被工作组“内定”为了右派，很快被搞得茕孑立，如鸟惊弓——一直到毛泽东到武汉游了一把泳，心情愉快地回到京城，公布了那张叫做《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我才知道我心情最坏的、被人跟踪盯梢的日子，叫做“五十天白色恐怖”。我不再从理论上，而完全打心眼里觉得毛泽东和咱心连心，我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得涕泗横流。士为知己者死。我开始真正的发狂了。

1966年八月，我写了一篇《致全市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一封信》，正是以这篇被人称为的“重庆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肇端，引发了西南山城的政治山崩。山崩总是从第一块石头开始的。我和重庆大学的“钟馗”们成了被最先推下来的石头。我们被上帝之手推动，我们去撞击别人，别人再撞击别人，别人又撞击我们，我们又撞击别人。我的个人生活通向不归之路，从此一波三折，九死一生，完全失了控。

这就是我如何成为了替人打鬼的钟馗的故事。

□ 写于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

## 【千秋功罪】

跳出黑白两极的是非分野

• 丁凯文 •

前两天在多维网上读到了霄云女士的文章：《我的父亲与吴法宪——写给金秋女士》（见本刊zk0311a），霄云女士是在读了金秋教授《林彪事件的教训》有感而发故做此文。因为金秋教授的文章是本人找来译成中文并首先在《枫华园》上发表，所以针对霄云女士的感想也愿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供大家一起参详。

### 一．中共的政治迫害

霄云女士在文章中感叹“事隔23年，政治风云之残忍早已被大书特书，但爸爸那段受迫害的因缘至今未被披露。”其实，自1976年中共粉碎“四人帮”后，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在全国大力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底，全国平反了涉及三百多万名干部的冤案，给47万多名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的无辜受牵连的人得以脱离政治迫害的苦海。然而，于此同时，中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迫害。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邓小平等人的主持操纵下，1980年开始了对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审判。其实这些人不过是中共政治斗争中被抛出来的替罪羊，成为中共清算毛泽东与文革的牺牲者。然而这种政治迫害却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这些所谓的审判，从中共文人肖思科等人的书《特别审判》就可看出其中之荒谬。审判之前先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由最高领导人拍板定案，将文革元凶毛泽东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美其名曰“犯了错误”，而手下的执行者则被冠以种种罪名判了各种名不符实的徒刑。邓小平、胡耀邦在审判前特别指示“有些人罪很大，要判无期徒刑的”，“起诉书的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黄永胜等人有功，量刑可以轻一点。”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共当局并非不知道毛泽东这个罪魁祸首的真实作用，而是刻意掩盖、粉饰毛的一切。邓小平说文革研究要“宜粗不宜细”，换句话说，就是不能深究文革之中种种事件的原委，那些骇人听闻的罪行最好都归结

为林彪和“四人帮”的作用，从而为毛作了最好的开脱。如此意义下的审判有可能是公正的吗？这难道不是新一轮的政治迫害吗？

有谁可以想像在美国法院审理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的案子前，美国总统、副总统和国会议长等人事前开会讨论好辛普森的罪名，定好刑期，再交由手下的检察官和法官照本宣科地去执行呢？由此可见，当年中共当局标榜的“公正”审判不过是一场闹剧，是将政治迫害换了另一副面孔而已。

具体到霄云女士父亲的案子，仔细读过霄文后仍然有令人不明就里之处。我想霄女士自己恐怕也不完全了解案子的真相，而是仅仅听信了中共当局的一面之辞。正是有了吴法宪的所谓“供词”（不要忘了中共最善于以部份不实之词指控那些被告人），霄云女士就认定了当年吴法宪积极投靠“四人帮”（其实1968年还根本没有后来才形成的“四人帮”）。退一万步说，就算的确是吴法宪当年派人抓了霄云女士的父亲，但他何以会如此呢？他仅仅是执行了江青的命令吗？以霄女士父亲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恐怕不是区区一个吴法宪就可以下令抓的吧。联系到中共内部各种专案系统，如果没有更高级别的人批准，吴法宪作为空军司令又有何权利下手抓公安系统的党内高级干部？霄女士愤恨地说“父亲的同案战友就死在吴法宪的监牢里。”这实在是过份夸大了吴法宪的作用，秦城监狱、北京市卫戍区监狱难道是吴法宪的私家监狱吗？它们难道不是共产党、毛泽东的监狱吗？正是由于中共这一体制才会制造出这么多的政治迫害和冤案。霄云女士自己也承认“今天在台上的人，明天成了阶下囚；今天站在正确路线，明天站在了错误路线；今天审讯别人的，明天站在了被告席……”可这一切的一切是谁造成的呢？

霄云女士在文章里对周恩来颇为怀念，似乎一切政治迫害与周无关，不仅如此，周还到处当好人，处处关心这些惨遭迫害的人，使得他们在凄惨的处境下感激涕零，没齿难忘。然而，我们要问一声，当初中共大搞政治迫害时，周在何处？按照霄女士的说法，在林彪死后，周恩来特别关照霄女士的家属去北京见自己的父亲，并指示为令尊做必要的手术，为何你们的探视一过，令尊大人依然“又经历了强化的审讯”呢？这种手术前后的做法难道不是在执行医疗为政治服务的政策吗？表面上，周是关照过不少人，但对毛泽东、江青认定要予以打倒的那些人时，周是不会手软的。周恩来难道不是所有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吗？那些成百上千被打倒的老干部们的逮捕、关押、审讯、判刑乃至处死的文件上没有周恩来的亲笔批示吗？例如，刘少奇一案上，周就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只要看看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奥妙。难道说搞专案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可这些专案的总负责却能清白无辜，出于泥而不染，这样的解释说得通吗？如今的中共当局仍然对此讳莫如深，似乎世上只存在了周恩来对种种政治迫害的恶行的抵制和设法减缓，而将周起的实际作用虚化之，仍将周放在圣人的位置上继续发挥为党为国的余热，这难道是实事求是的吗？难怪毛家的后人在看了大型记录片《周恩来》后发出“好事都是他干的，坏事都是我们家干的”的感叹。我们如今难道不应该揭开这一层蒙在上面的迷雾，还周恩来应有的地位吗？

中共在80年代对林彪和“四人帮”集团的审判显然不是什么公正审判，恰恰是中共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而有选择地挑选了一些替罪羊，然后将全部的污水倒在他们的头上，反正他们已被当局宣布为“坏人”，要为文革浩劫负责，他们不配享有应有的人权，对他们怎样进行侮辱、诋毁和人身攻击都不会过份，他们似乎没干过一件好事，即使曾经干了某件好事也一定是居心叵测。而那些胜利者们似乎就个个白璧无瑕，清白无辜，他们不必为整个体制的黑暗负任何的责任。这实在是对历史的嘲讽。在笔者看来，那场审判不过是政治迫害的延续。如果我们要重新认识历史，就必须正本清源，就必须从批毛开始，从彻底批判中共体制开始，彻底揭开被当局蓄意掩盖的事实，还历史本来面貌，而不仅仅着眼于当年某某人抓了某某人，将政治迫害这笔帐算在某个执行者个人身上，那样不过是将历史真相狭隘化而已。

## 二．霄女士的父亲何以遭受迫害？

迄今为止，我们并不清楚霄女士的父亲是何人。霄女士自己承认其父是中共上海负责公安工作的主要干部。霄女士说其父惨遭政治迫害完全是因为忠实地执行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密令而得罪了江青，所以文革中惨遭江青毒手。然而，霄女士的文章还是给人以语焉不详之感。

既然是毛泽东当年下令调查江青在上海的历史，特别是还涉及所谓“自首叛变”等问题，为何霄女士的父亲在调查过后，“调查的材料一直被封存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密档案室，没有上报”？这显然不符合中共的体制，特别是这一重要任务来自最高领导，并通过公安部部长亲自传达，霄女士的父亲怎么会在调查过后就封存档案，不予上报呢？笔者更相信霄女士的父亲在亲自部署调查后通过自己的系统上报中央，直达天听，不可能“为了毛泽东的权威和江青的名声”而将调查材料“封存”了事，而且此事是发生在霄女士所言的1954年，当时的江青根本还默默无闻，也不可能对上海公安系统大发雌威，霄女士的父亲怎么可能“没有上报”呢？

还有一事，即霄女士指责林彪“认定我爸爸对林彪安置了窃听器”，所以林彪也参与了对霄父的迫害。过去揭批林彪集团所谓罪行时，从未听闻林彪因恐惧被窃听而大肆迫害公安系统的人。如果确有此事，恐怕当年的“两案”审判中早就拿来大作文了。中共自己倒承认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议认可背着毛泽东给毛安装了各种窃听器，导致事后毛将有关人等一举拿下，打倒的打倒，流放的流放。笔者希望霄女士对此问题能给出更详细可靠的证据，而非道听途说。

到了文革时，霄女士的父亲开始受到江青的迫害，被指“整了黑材料”，“陷害毛主席”。这时江青的势力如日中天到处张口咬人，揪住当年上海公安调查她的旧事不放，要将霄父置之死地而后快。可这时的毛作为亲自下令调查的人，为何却默不作声，听任自己的恶婆娘“打击一大片”呢？显然，毛泽东是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霄女士的父亲不过是忠实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而已，可此时的毛对此却不置一词，丝毫没有为霄父开脱责任之举。霄女士现在将批判矛头对准了江青，虽说并不错，但却没有真正击中靶心。那毛泽东才是这场政治迫害的根源，霄女士对江青的批判只是舍本逐末而已，毛才是导致霄父惨遭迫害的元凶巨恶。毛的真实意图就是要扫荡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中央及地方的各种势力，扶持另一批亲信人马来接班，而霄女士的父亲不幸就是毛要打倒的这批人中的一个罢了。所以，我们在谴责中共政治迫害之时，必须要追根溯源，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行和中共专制独裁的体制。

## 三．怎样看待林彪一案？

霄云女士写道“近来看到一些企图为林彪集团喊冤翻案的动向……但我不相信林彪可以由黑变白。”显然，霄女士的看法有着相当的代表性。

其实，这种观点是一种简单的二分法，即这个世界只存在着“好人”和“坏人”的黑白两极。那么既然林彪集团已被当局宣布为反革命集团，打入另册，判了政治的死刑，也就是中共口中的坏人，自然就是漆黑一团，无需再追究林彪事件的真相了。可是，历史就是这样单纯吗？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将林彪集团归纳入“坏人”的行列，彻底批倒批臭就完事了吗？那么中共当局在林彪事件上造的假，罗织的罪名就是天经地义的，无需再做研究剖析吗？

不错，本人在研究林彪事件问题上写过几篇文章，是霄云女士口中“为林彪喊冤翻案的动向”。然而，我们的研究并非仅仅将讨论定位于“为林彪翻案”，而是全面探讨林彪事件的原委，特别是讨论“913事件”的来龙去脉，到底林彪有没有想当国家主席从而篡党夺权，存不存在林彪“阴谋政变杀毛”的神话？我们并不因为有了官方的“标准版说辞”就全盘认可了当局的指证。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讳言林彪曾在文革中助毛为虐，当了毛发动文革的帮凶。其实，

文革中又何止林彪一人如此呢？可以说文革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毛的领导下共同投身于洪流的一场浩劫，中共高干们有几个人是真正乾淨的呢？霄女士顺便指责林立果区区 26 岁却当了空军作战部部长（应为副部长，还是挂名的），可毛泽东的女儿李纳不也北大毕业没几天就当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 30 来岁就当了解放军上将才能当的沈阳军区政委吗？他们的地位远高于林立果当年的实际地位。再看看如今中共太子党们的抓权捞钱行径，林立果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笔者在此只想向那些依然将林彪事件简单地“黑白化”的朋友们说，我们实在应该跳出中共当年划定的框架。我们对文革的反思、研究不是仅仅讨论一个谁对谁错，谁忠谁奸，谁黑谁白的问题。正如霄云女士所言“天下哪有一贯正确的人？”所以，我们对林彪事件的研究也一样应秉持这一精神，全面认真地梳理这一事件，将中共强加在林彪头上那些并不属于林彪的罪状清理出来，公正地评价这段历史。其实，金秋教授的文章也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平心静气地讨论相关问题。笔者也希望霄云女士抛开简单的黑白二分法全面地看待这段历史，这才是我们分析研究林彪事件所应持有的态度。

笔者曾就霄云女士的文章询问过金秋教授。金秋教授极为坦诚地对我说，霄云女士的文章说明了目前研究当代中国历史，尤其是文革史的难度。首先，这段历史牵扯到太多的个人恩怨。在绞肉机式的政治制度下，很少身涉政治的人能够保持自己的清白。这实际上是卷入毛泽东时代政治的人们的集体悲哀。实际上，纵观国际政治，各国高层政治都存在同样的现象，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在中国，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给太多的个人以及家庭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悲剧。问题更在于，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从父辈的恩怨中摆脱出来。能不能跳出个人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如果我们这一代及其后人还沉浸在个人或家庭的恩恩怨怨中而继续相互伤害的话，那将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其次，在公众的记忆中，文革这段历史已被高度政治化。由于官方长期控制舆论和宣传工具，官方认可的历史已经基本控制了集体与公众的记忆。林彪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一提林彪，模式化的脸谱立即出现，即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林彪，江青以及官方筛选出来的少数人成为文革中所有罪行的“替罪羊”。一旦他们被认定为“敌人”，公众就可以任意践踏他们而不受良心的谴责。历史人物是最容易受到好人/坏人的评价。对好人的批评必须全面且公正，而对所谓的坏人就可以口诛笔伐，任意诋毁，甚至歪曲历史编织出各种天方夜谭式的故事。有没有人想过，世界上有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即使是被认定为“坏人”的人是否也一样有权利享受做人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存和不受个人侵犯的权利？而且“好人”“坏人”是由谁来界定的？即使林彪被认定办了一万件“坏事”，也不能证明他在“林彪事件”上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们能不能摆脱长期以来由于官方大力宣传所导致的历史性的误导，是文革研究的一大难题。

最重要的是，历史能不能用“黑白”来界定？历史应是多维性的，并具有包容性。应该允许不同的观点相互切磋。不能一提不同观点，就是“翻案”。对历史学家来说，历史研究不是定案，不能简单的盖棺论定，而是尽量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历史，使其更“有血有肉”，更具有“真实性”（真实性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然而，可悲的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下，这一点是很难成为共识的。太多的个人恩怨。太多的血腥，太多的无辜受害者，而又有太多的人充当双重角色，即参与了伤害别人，自己又是受害者。有谁能说得清楚？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金秋教授感到十分无奈与悲哀。金秋教授说：“有多少人，包括我自己，能够摆脱毛泽东时代政治的阴影？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心平气和地研究历史而不作个人攻击？难道我们这些从文革中长大的人经历过的‘语言暴力’还少吗？为什么还要用舌剑唇枪去伤害别人？经历了长期的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人们的最后一点人性都似乎在消失。一提到仇恨，一

提到‘敌人’，人就会变得疯狂。所以，我们希望所有中国人都有能力摆脱半个世纪以来残酷政治斗争给我们带来的阴影，能够学会尊敬别人，能够公正地对待别人，即使是那些曾经被认定是你的敌人的人。”金秋教授最后说：“摆脱自我而认真地严肃地研究历史，这至少是我个人所追求的目标。”笔者也期待今后能看到金秋教授更多的著述。

~~~~~

## 【痛定思痛】

### 我看37年前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 孟令伟 •

1966年的8月初，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出台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16条。这次会议和这个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从那时到现在，已有37个年头。对37年前爆发的这场运动可以说是口诛笔伐的已经很多了。“十年浩劫”、“空前浩劫”、“十年大动乱”等无以复加的谴责语言表达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深恶痛绝，也形像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危害。但如果用更为客观的眼光看，文化大革命其实不过是一系列历史事件演变的结果，事实上，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假使没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条件，领导者和少数人即使能量再大也难以发动起来。从另一方面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值得肯定的东西，比如一些干部平时当官做老爷，有仗势欺压群众或贪污腐败的种种劣迹行为，在文革中遭到群众的斗争批判，尽管方式不妥，却总是得到了某种应得的报应。对群众而言，也总算是出了积攒很久的一口恶气。对这种现象就必须看到有其合理的一面。而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罕见。所以，站在世纪之初的高度看待37年前的这场“大革命”，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已有的结论上，更不能仅仅以祸害的角度去看待它。而要看到荒谬中有其必然，邪恶中有其正义，无法无天中有其合情合理之处，空前绝后中有其物极必反的一面。

文化大革命从规模上来说史无前例，但就其性质看并不是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多次发生过类似的小革命或中革命，文化大革命不过是这一系列“革命”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而已。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的领导干部会议上，讨论文革是否是一场“空前浩劫”时，时任副委员长的谭震林拍案而起说：“什么空前浩劫！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苏区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千人，难道不是浩劫？”谭震林讲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在中央苏区的肃清所谓反革命AB团的“富田”事件，当时大搞逼供信，红二十军从班长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杀，连陈毅和胡耀邦也险些被杀；在此前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也发生了类似的惨案，2500多名排以上干部被逮捕和杀害；再接着是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也是大搞逼供信，成百上千的“叛徒”、“特务”被“抢救”出来；建国初期，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伤害了一批人；“三反”运动时，不少地方为了完成打“老虎”任务，搞逼供、诱供，打出了一大批“假老虎”，全国高达18.9万人；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潘汉年、杨帆冤案，由此引发的肃反运动由于“错斗”、“错捕”、“错关”、“错判”，又造成一批人的冤案；1957年反右运动中，把包括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在内的55万人定为右派；1958年在军内反教条主义中，肖克、李达等一批人被错误地定性为“贩卖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反党反军委领导的宗派主义活动”的“小班子”，并伤及德高望重的刘伯承元帅；1959年“庐山会议”构陷的“彭、黄、张、周”冤案，由此引发的“反右倾”运动中遭到批判或被划为右倾分子的党员干部竟达365万人之多；1962年在对小说《刘志丹》批判中构陷的以习仲勋为首的“反党集团”；1963—1965年在农村和城市分别开展的“四清”和“五反”运动，提出农村以至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掌握在敌人手中，大搞扎根串联，“层层追根”，支持地方出现的夺权事件，这实际上成为文化

大革命的先声。由此可见，从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肃清AB团到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的“四清”和“五反”运动，在党内、军内、政权范围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演一场人为制造的“革命”，就会有一批人被无辜地打倒或“消灭”。区别只在于“革命”的大小、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换句话说，早从中央苏区开始，就始终有一个以革命名义存在的阴暗面在活动，在发展，在寻找机会制造那无法无天的悲剧。可以说是屡屡得手，无往不胜，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到文化大革命，这个阴暗面终于迎来了充份展露才华、展露能量、展露面目的时期，于是几十年来的“小革命”和“中革命”终于发展成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几十年的“小悲剧”和“中悲剧”终于发展成空前的“大悲剧”，几十年来“小范围”和“中范围”的无法无天终于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无法无天。

文化大革命使大多数老干部成为受整的对象，但其中有相当一部份干部在以往的运动中也整过别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的全面挨整不过是以往运动中干部你整我我整你的“合理”发展而已。指出这个事实的确会令许多人不快，会触动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红卫兵小将”羞辱、而后“蹲牛棚”受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以受害者的姿态揭露文化大革命种种“整人”罪行，却避而不谈自己在历史上也曾整过人的人们的神经。但要彻底反思文化大革命，要真正做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揭开这个“血淋淋的创伤”。事实上，由于几十年来各种运动的此起彼伏，由于每一次运动都要求触及每个人的思想灵魂，都要求有“对立面的不调和的斗争”，都要求自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武器，而每一次运动的必要性和神圣性又是那样的不容置疑，所以，多少年过来，干部中很少有人置身于“整人和被整”的圈子之外。区别只在于整与被整的程度不同、积极主动和不得不整不同、往死里整和马虎应付不同，如此而已。即使是道德高尚的人物也很难例外。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老干部挨整，固然和林彪、“四人帮”的利用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已经奠定了这个基础。既然以前是你整我、我整你的一笔糊涂帐，文化大革命来一次“打倒一切”的总算帐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文化大革命表面看天下大乱，但实际上是由毛泽东个人主导下的天下大乱，自古以来，个人能量和权力没有达到这么大的。这既是由许多人推动的个人崇拜所致，更是体制高度集中、权力高度集中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先是红卫兵的大串联、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后是造反派的全面夺权、各派之间的大混战，诸如此类的大动乱持续了几年之久。从表面上看，确是天下大乱。但实际上对形势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毛泽东一个人手中。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红卫兵的大批判、大串联是毛泽东亲自鼓励的，造反派的全面夺权是毛泽东亲自支持的；后来为了控制形势，又由毛泽东提出革命派“大联合”、领导班子的“三结合”，决定搞“三支两军”，要求“抓革命，促生产”，批判“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行为和思潮，号召城市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九大”以后又进一步布置了“斗、批、改”的任务，秩序有所恢复；再以后是领导粉碎了“林彪集团”，起用邓小平，同时批评和遏制了“四人帮”，让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选择华国锋为接班人，为粉碎“四人帮”、最后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也始终是文化大革命形势的主导者。在文革中，只有毛泽东具有最高的裁判权，只有毛泽东神圣不可侵犯。每一次接见、每一项指示、每句话都是绝对权威。文化大革命打倒了所有众神，树立起了惟一的神，这个神就是毛泽东。过去的皇帝可以在背后骂，神可以不敬，文革中的毛泽东却没有不顶礼膜拜的。而且是天天顶礼膜拜，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虔诚，那样的由衷。因为那时的毛泽东不仅是皇帝，而且是万帝之帝，不但是神，而且是万神之神，是普照万物的上帝神、太阳神。惟其如此，毛泽东才可以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并且能始终主导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自古以来，就个人权威和能量而言，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和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比肩。所以文化大革命的乱是表面的乱，人为的乱，有目的的乱，为我所用的乱，是个人极权前提下先则纵容、后则控制的乱。所以才有“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说法。而毛泽东能获得如此“玩乾坤于股掌”的权威，固然和他对革命的

巨大贡献分不开，和他超人的才智与个人魅力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领袖崇拜的极端化发展，另一个是体制弊端的极端化的发展。这两个原因中具有根本性决定性的又是体制原因。在发展对毛泽东的领袖崇拜中，林彪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始作俑者却是党内的另外一些人。实际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后来在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地位上仅次于毛泽东的领导人到普通干部群众共同推动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转化为个人迷信，个人迷信又转化为个人神化，个人神化再转化为超级神化，毛泽东成为万神之神的同时也就掌握了绝对权力和绝对真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也就具备了。而当年鼓吹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也就毫不奇怪了。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没有一个体制作支撑，单靠人为提倡个人崇拜，既难成气候，更不可能形成社会性的气候。这种支撑个人崇拜的体制，只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包括党务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的权力都高度集中。权力集中易于产生和发展个人崇拜，在这种体制下出类拔萃的领袖由于其能力和权力的结合会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能力不怎么样的领袖则会利用权力制造虚假的形像来供人们崇拜。而个人崇拜的发展又会进一步推动权力的集中，使原来的权力更为集中，原来不怎么集中的权力促进其集中。在这一过程中，就逐步形成个人集权、个人专制、个人凌驾于整个体制和国家之上的现实。而一旦形成这样的极权条件，又出现大的决策错误，像毛泽东这样想象力丰富又才智超群的领袖就会演出类似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想象力平凡和智力平凡的领袖也会干出另外一些祸国殃民的荒唐事。

文化大革命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国家机体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如官僚阶层与群众的矛盾，上层与下层的矛盾，党内与党外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些矛盾，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证明了解决这些矛盾的重要性。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很复杂的，既有防修反修的意图，也有为贯彻自己的主张清除阻力的打算。另外，还包含着反官僚主义、特别是反对党内干部高高在上，和普通党员、党外群众、基层人员形成对立的考虑。一些当权者仗权欺压群众，甚至鱼肉群众，还有一些当权者在工作中长期搞强迫命令，动辄打击报复；一些当权者贪占严重，生活腐败，还有一些当权者在过去的运动中整了不少人。所有这些霸道的“官僚主义”及其行为，自然要成为文化大革命打击的对象。毛泽东提出的“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资产阶级的坏干部”，理所当然地包括这些人在内。文革前开展的“四清”就已经提出了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上述干部问题。而从已经开展“四清”运动的地区看，这方面的人和事的确揭露了不少，整了一批应当整的“四不清”干部，出了许多群众的气。当然，同时也冤枉了一批人。正如《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所评价的那样：“历时三年多的城乡社教运动（指“四清”和“五反”运动——引者注），对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对相当一部份干部来说，文化大革命对他们固然有不公正的一面，也有公正的地方。不能笼统地说所有在文革中受整的干部都是纯粹的被迫害者。另外，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的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从冲破高度集中的体制、让群众真正当家作主而言，并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中国的改革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从本质上说正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群众自发搞大包干，后来又搞村民自治，都不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实践吗？当然，文化大革命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官僚体制、官僚主义阶层和群众的矛盾，相反却把这个矛盾弄得更加复杂化甚至有点扑朔迷离了。但文化大革命以极端的方式提出并证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中国要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就是要变高度集中的官僚命令体制为民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治理体制，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阶层和群众的对立问题。

文化大革命将以往历次运动的弊端推向极端，文化大革命将以往的黑暗面、黑暗势力发展到极端，文化大革命使积累的历史问题做了最充分的暴露，文化大革命使长期以来积累的社会矛盾充份集中在一起并使其简单化了，文化大革命使迫害者和受害者、斗争者和被斗者、别有用心者和诚心诚意者、造反派和当权派、红卫兵小将和革命老干部、“黑五类”和“根正苗红者”、



官员和群众、上层和下层、领袖和人民、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感到极度疲惫、前途渺茫，从而为彻底结束运动、走出极左怪圈、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准备了条件。古语说“物极必反”。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有贡献，那么主要贡献就在于通过它达到了这个“极”，因而以后才比较顺利地实现了拨乱反正。严格地说，文化大革命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受迫害者固然是失败者，然而许多迫害者后来又何尝不是受害者？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是当初最大的迫害者和胜利者，后来怎么样呢？千百万红卫兵小将在文革初期好不风光，转眼之间就被大批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后遗症一直到现在。各地的造反派先是在武斗中死了大批人，一些佼佼者经过恶斗狠批立下“汗马功劳”，好不容易被结合到革委会去，不久就开始尝到受排挤的滋味，林彪集团完蛋后其中一些人被打入和林彪集团有关的另册，粉碎“四人帮”后又有不少人被作为“四人帮”的爪牙处理，剩下一些人最终也因为“打、砸、抢”上台被清除了领导班子。毛泽东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从表面上看是胜利者，文化大革命使毛泽东的个人权威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林彪的败亡使他生前就受到道义上的沉重打击，过世后又把一个濒临崩溃的烂摊子留给了后人，作为领袖的名声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结果还是毫无胜利可言。正是在这种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而且最终几乎都成为文革受害者并都感到绝望的情况下，举国上下才陷入对文化大革命的深沉反思，才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深重危害，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几十年来左的运动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我们国家的真实情况以及和国际的差距，从而为彻底平反冤假错案、走出运动怪圈、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文化大革命集以往运动之大成并将其发扬光大，使以往所有的问题、弊端、黑暗面得到了最集中、最充份、最全面、最淋漓尽致的暴露，不但使历史上难以明辨的是非变得简单了，而且使人们从灵魂深处对这些是是非非感到深恶痛绝，再也不想走过去的老路，甚至不愿想过去的问题，历史转折也就从此开始了。

重要参考书目：

- 1、《凯歌行进的时期》林蕴晖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 2、《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 3、《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主编胡绳

~~~~~  
【各抒己见】

中国人为何迄今敬重周恩来？

• 高伐林 •

（2003年4月19日，纽约法拉盛图书馆举办了“周恩来新论”研讨会，此为作者的发言摘要。）

“文革”摧毁了毛泽东的形象，却成就了周恩来的名声。我们都记得撼动人心的诗句：“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撒万家。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一月八。”（“童怀周”《天安门诗抄》）以及广播电台里的配乐诗朗诵《周总理，你在哪里？》，记得郭兰英的《绣金匾》——“一绣毛”与“二绣朱”，都还保持了圆润嘹亮，惟独到“三绣周”时泣不成声，产生巨大的感染力。

周恩来如此巨大的感染力从何而来？

我们先来梳理周恩来在中国民间威望的脉络。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堪称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人物关系之一。如果说，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所记述的文革年代的前期，老百姓看待周恩来更侧重于从政治层面，也就是

说，将之视为“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在民间的威望，随毛泽东“水涨船高”的话，那么从林彪事件划界，在文革后期，老百姓看待周恩来的着眼点转到了道德伦理层面，他在民间的威望，与毛泽东呈现“水落石出”——毛愈低而周愈高。

毛泽东及“四人帮”处心积虑打压周恩来的许多图谋，虽然当时不可能被民众知悉，是由高文谦的新书首次披露，但在文革几次浪潮中训练出高度政治敏感的民众，能够感知许多蛛丝马迹。毛及“四人帮”对周的打压激发出了民间逆反心理，官方的评价与民间的威望之间的落差，使民众为周打抱不平。这种感情，在特定历史阶段发酵升温，最后酿成“四五”大规模抗议，终于导向浩劫结束，在历史上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周恩来的形象急速升值。

从1973年十大以后，毛及“四人帮”与周所代表的路线的矛盾日益激化，他们刻意打造周“相”形象——用了种种当时人们公认为是负面奸臣的历史人物如吕不韦、李鸿章……来含沙射影；民众认可“相”这一符号，但他们认为周是一位“贤相”，另找出历史人物如诸葛亮、文天祥……来比附，文革结束后，这种颂扬完全公开化了，民众传诵他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克己奉公，忍辱负重，忠君爱民……

赵无眠先生在《真假周恩来》一书中分析过潜藏在民众潜意识中的对周的“恋父情结”：周自己没有子女，说“全中国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人们对有一种对父亲的感情，以之为心理依托——不管天灾人祸，总有总理在牵挂我们，为我们呕心沥血想办法。当周辞世，人们除了悲痛还有惶恐：庇荫的大树一般的“父亲”没有了，往后得自己去面对灾难、风浪了。

此外，还必须提到一个重要因素：恰恰是周恩来而不是别人，在四届人大上宣布四化目标。民众将四化（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的代名词）与周联系在一起，提起四化必联想起周，提起周必联想起四化。而四化这一目标在文革后期遭到打压，甚至被弃置，使周带上殉道者的光芒。

回顾这一过程，归纳起来，简而言之，文革后掌权的官方与民间在四个问题上实现了“扬周”的耦合：

1，当毛与文革随风而逝，作为替代，为了填补真空，官方需要周这个新的寄托感情的偶像，人民需要周这个能在精神上庇护自己的“慈父”；

2，“文革”后新的领导集团上台，急需找到合法性来源，意识到：只有得到民心，社会才安定，所以要发展国民经济，改善百姓生活，周正好与这一目标相联系；

3，新的领导集团需要树立自己号令天下的权威，就需要整个官僚机构和民众像周那样忠心耿耿、兢兢业业；而民众出于儒家文化积淀，认同周为贤相典范，认同他顺从君权、恪守本分。

4，中共建政数十年，迫害了千万民众，积怨甚深。为了证明新的领导集团确实改弦更张，向被统治者的意愿让步，方式之一是改采以民众信服的形象，来取信于民，缓解怒火，以使被统治者放弃追究罪责。

就这样，官方有宣传周的政治需要，民间有崇敬周的心理需要。两种需要合流，官方与民间共同打造了一个红色江山的管家。

毛泽东走下神坛，走进暴君元凶行列；周恩来走下圣坛，却没有走进帮凶奸臣队伍。邓小平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

这话耐人寻味：就连邓小平也承认，周确实做了错事乃至坏事；不过他认为周是“违心”，也就是说，所处地位困难，迫不得已，所以人民原谅他。

邓小平这个判断从逻辑上说是是否成立姑且不论，但作为对现象的描绘，却基本符合事实——我们看到，多年来人们确实对周恩来采取原谅态度。

既然人们以前崇敬缅怀周恩来，是出于无法得到充分信息，并不真正知道他当时的所作所为，相当程度上是塑造一个理想形象来否定黑暗的现实；那么随着历史禁区被打开，更多关于周恩来的真相被披露，合乎逻辑的发展应该是：当人们得知这个理想形象并不理想，崇敬心理应该消退。但是情况并不如此。《晚年周恩来》提供系统翔实的内幕资料，却并未使众多民众改变对周的景仰。该书出版消息公布后，多维新闻网“大家论坛”立即出现不少读者反响，多数似乎并不认同作者——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读到全书，并不妨碍他们预先作出否定该书的结论。

例如，从4月6日到4月11日六天比较集中的共34条反映中，只有少数帖子认为周恩来在国人“心中的崇高位置是历来的宣传造成的”，“非常敬佩高先生的勇气与付出”但19条表示不会改变敬重周的态度，周是“难得的忠臣”“中国历史中的伟人”“谁敢否认周恩来是世上接见外宾最多的总理？”认为高文谦是“诋毁周恩来，你能比周恩来做得更好？”“卖主求荣”、“出卖灵魂”、“侮辱一个伟人的形象来换取残羹剩饭”。

为什么会这样？初步分析，我认为至少应该有如下几条原因：

首先，我们既有的思维方式像筛子，让我们过滤新的信息。本来，对于事实的了解应当先于对事实的价值判断。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却往往对信息“各取所需”，取舍的标准就是他的既定的价值观念，这种成见强烈影响着他对事物的观察、对信息的获取。“人所看见的东西都是他早已相信的东西”，信则有，诚则灵。成见与我们所受的灌输有关——所谓“灌输”，就是让一个人在亲眼看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模样之前就被告知、就相信它是什么模样。

其次，很多人仍然习惯于从主观动机而不是从实际作为去评判一个人，习惯从作为个人的“私德”而不是作为政治家的“公德”去评判政治人物，民众相信周是“好心”，相信他是“违心”，于是认识到此止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没有犯过错误？没有必要“苛责”周恩来。

再次，很多人要维护的并不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周恩来，而是自己心目中想象的周恩来，这个周恩来，是与这些人自己人生经历中一段难以割舍的岁月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感情上无法重新抉择：追问这个周恩来的形象，也就意味着要颠覆自己人生中那一段岁月。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周在个人品德上的廉洁勤勉，律己奉公，当年被民众用来否定毛、林、江等人的暴虐、偏执，今天，也成为人们抨击中共权力场中腐败贪婪的参照系。当贪污渎职、赤裸裸地争权夺利成为今天官场的常态，人们很自然要怀念周总理办公室通宵不灭的灯光，他补了又补的睡衣——与其说是敬重周恩来，不如说是痛恨大小贪官。

因为时间关系，许多问题来不及展开细说。总之，探讨民众为什么至今仍然敬重周恩来，这个问题并不是吃饱了没事做，而是要清理周恩来究竟留下什么精神遗产？要探讨“文革”悲剧中除了毛泽东应负的责任，中共其他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和这个体制，应负什么责任？同

时，也是要反省我们作为民族的成员、文革的参加者和时代的见证人，每个人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我们虽然并没有掌权，但是我们的感情、态度同样承前启后：那个时代的风暴扬起的漫天劫灰，同样落在我们的心里，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还可能孕育生长中国今后的悲剧。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